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唐代翰林学士

□ 毛 蕾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唐代翰林学士

□毛 蕾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翰林学士/毛蕾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1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ISBN 7-80149-418-0

I. 唐… II. 毛… III. 大学士,翰林—研究—中国—
唐代 IV. D69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9292 号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唐代翰林学士



著 者: 毛 蕾

责任编辑: 王小甫 范广伟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7.5

字 数: 142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18-0/K·044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 逸

副主任委员 齐世荣 金冲及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思治 刘桂生 刘家和 阮芳纪 (常务)

陈铁健 张振鹍 张椿年 经君健

郭松义 谢曙光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沈志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刘 逖 李世安 李丹慧

杨 群 陈东林 范广伟 黄燕生

FL623/68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1998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还要不断改进，把工作做得更好。

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7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有专家推荐、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

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表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合格的好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五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

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唐代翰林学士》序

韩国磐

毛蕾女士的博士论文《唐代翰林学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了大量正史、杂史、文集、笔记小说以及出土墓志的等资料，对唐代的翰林学士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探讨，藉此可窥全豹。其中对某些问题如翰林学士人数、学士职责、学士权力大小变化等，咸能从发展变化中进行动态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明确将翰林院和学士院的发生发展区分开来。在学院成立后，对翰林待诏的论述，眉目清楚，区别了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俾免二者的混淆，尤有见地。因斯篇研究的有所收获，故为之序。

公元二千年四月下旬韩国磐志。

前 言

翰林学士是唐代中期以后出现的重要职官，是唐代政治制度演变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唐六典》、《通典》都未有记载，两唐书官志部分的记载也十分简略，不足以概括翰林学士的全貌。不过，唐人韦执谊、李肇、韦处厚、元稹、丁居晦等都在居职翰林学士期间留下了相关的文字记录，在南宋时即由洪遵汇编成《翰苑群书》，其中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收录开元至咸通约 180 名翰林学士的姓名及其官职迁转情况，史料价值尤丰。散落在两唐书、唐人文集、杂史小说等文献材料中关于唐翰林学士的记载亦有相当数量。自宋以降，较早对唐翰林学士作出评述的当属《唐鉴》及《文献通考》。范祖禹指出：“中书门下，出纳王命之司也，故诏敕行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职始分。既发号令，预谋议，则自宰相以下，进退轻重系之，岂特取其词艺而已哉！”^①《文献通考》引致堂胡氏的话对唐翰林学士分割中书之权提出批评：

① （宋）范祖禹：《唐鉴》卷 5《玄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刻本，上海，1984。

国家陟降多士，当出于中书。中书有私徇，小则诘责，大则黜削可也，不当疑其专而分其权。翰林初置，人才与杂流并处，其后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专以处忠贤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内相”之称，则非王政设官之体矣。……进退辅弼，既与之谋，安知无请托之嫌？小人处之，附下罔上，安知无卖主之事？^①

及至明清，著名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都有一定篇幅论及唐翰林学士^②，其中钱大昕最早指出翰林学士为差遣无品秩，“既内而翰林学士、集贤、史馆诸职，亦系差遣无品秩，故常假以他官。有官则有品，官有迁转，而供职如故也。”而清纪昀等所撰《历代职官表》在论述翰林院历代建置沿革过程时，已经注意到唐宋翰林与明清翰林有显著区别：

然唐宋所谓翰林学士者，其职在于参受密命，发演丝纶，乃如今军机大臣之承净旨书宣，而于他事固无所预。故其时国史著作之官，仍以文字著述各守职司，别为一署，不相统摄。自明代改定官制，举历代所为国史著作之属，悉废不置，独并其所掌于翰林院，于是翰林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54《职官考八》学士院条引，第489页，中华书局影印版，北京，1986。

② 见（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4《翰林》，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上海，1985。（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8《职官志》，第996页，商务印书馆，北京，1958。（清）赵翼：《陔余丛考》卷26《翰林》、《学士》，第521～524页，商务印书馆，上海，1957。（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74《新纪不见王叔文》条，北京市中国书店影印版，北京，1987。

遂为职事官。虽沿用唐宋学士院旧名，其实即历代国史著作之任，与唐宋之典内庭书诏者迥不相同矣。^①

也就是说，从职能变化的角度来看，唐宋翰林“典内庭书诏”，与清之军机大臣“承净旨书宣”的性质相类；而明清翰林虽沿用了“唐宋学士院旧名”，其所从事的只是“历代国史著作之任”，并不参与书诏密命，其性质为文化机构。

当代对翰林学士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其中用功最深、在考证方面成果最巨者当推岑仲勉先生。岑先生 40 年代即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相继发表《补唐代翰林两记》、《翰林学士壁记注补》两篇长文（后收入岑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利用正史、诗文、小说、金石等材料对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所载翰林学士的情况逐一进行爬梳考证，并对《壁记》所缺之晚唐翰林学士姓名、事迹等作了补充，考订之细致，补充之精详，令人钦叹。本文于中获益良多。岑先生另有《〈白氏长庆集〉伪文》一文亦于 40 年代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后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将《白氏长庆集》中《翰林制诏》部分约 200 篇制文逐一与史文检核，考订出相当数量伪制，此亦为进一步探究翰林学士草制职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除岑仲勉先生的研究成果外，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翰林学士的研究在国内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热

^①（清）纪昀等：《历代职官表》卷 23《翰林院》历代建置条，第 43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版，上海，1989。

点,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专论文章已逾10篇^①,其中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一文篇幅较大,约2万余言。总的来说,学者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对翰林学士在唐后期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的描述,并且评价较高。认为翰林学士是唐后期“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一股政治势力”(杨友庭语),是“皇帝提拔大臣,经供奉内廷后出任宰相的必经之途”(赵康语)。值得一提的是,张东光《唐宋时期的中枢秘书官》一文指出,唐宋时期可以说是两套秘书班子并存,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分别代表皇帝和宰相机构行使草诏出令的职能。我们认为这一概括是有道理的。专著方面,袁刚新著《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隋唐中枢体制在唐中期以后发生巨大变化,翰林学士在内廷掌诏令,“取代了旧中书省的中枢地位”,与枢密、中书门下“共同构成了唐后期新的政治中枢”。此外,张国刚《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1987)、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

① 杨友庭:《唐代翰林学士略论》,《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三期。赵康:《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学术月刊》1986年第十期。李雪华:《唐代翰林学士考述》,《贵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袁刚:《唐代翰林学士反对宦官的斗争》,《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二期。王永平:《论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晋阳学刊》1990年第二期。赵奇:《唐宋皇家高级机要秘书:翰林学士》,《泰安师专学报》1990年第二期。袁刚:《唐代的翰林学士》,《文史》第33辑。程宗才:《唐代翰林学士与宰相》,《史学月刊》1991年第五期。辛德勇:《大明宫西夹城与翰林院学士院诸问题》,《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四期。徐茂明:《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学士设置时间考辨》,《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三期。张东光:《唐宋时期的中枢秘书官》,《历史研究》1995年第四期。

局,1993)都在一定程度论及翰林学士。张国刚认为,唐后期除承旨学士受倚重外,其他学士并不都掌中枢机密,许多翰林制诏实际上只是例行公文。谢元鲁指出,翰林学士进入决策核心集团,是由于皇帝不断加强自己决策权力的趋向所致。陈仲安则从唐后期使职差遣盛行的角度,对翰林学士成为使职的过程进行了概括。台港及日本学者对翰林学士的关注早于大陆。日本学者山本隆义、矢野主税等在50年代即开始对翰林学士进行研究,其着眼点多在指出学士为天子私人,学士侵蚀相权,表示君主权力的强化。^①香港学者刘健明则认为翰林学士并无实权,地位因信任程度而有升降不定的现象,并非君主特意设置以提高君权、削弱相权的工具。学士虽侵害宰相的决策权力,但对宰相的行政权力未构成很大侵蚀。^②台湾学者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湾大化书局,1976)一书在分析唐代宰相实权变化的过程中,也指出翰林学士虽每侵蚀相权,但一般而论权势仍有逊于宰相,学士为谋求政治上进一步发展,多望能作宰相。

学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对翰林学士作专题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限于篇幅和研究角度,目前尚未有专文以唐翰林学士为主体进行系统分析,一些看法诸如翰林学士与皇权、与决策、与中枢体制的关系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论证。关于翰林学士的地位、性质、作用等问题学界评价不一,也需要作进一步深入具体的探讨,以期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概括

① 山本隆义:《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载《东方学》第四期,1952。矢野主税:《唐代的翰林学士院》,载《史学研究》第五十号,1953。

② 刘健明:《论唐代的翰林院》,载《食货》第十五卷第七、八期,1986。

而言，我们认为对唐翰林学士的研究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首先，5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成果对分析翰林学士的特殊性帮助甚大。自1957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唐长安大明宫断续进行了30多年的勘测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①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环绕大明宫的“夹城”结构，右银台门及翰林院位置的确定。这有助于形象地了解唐代朝参制度及翰林学士“密迩禁廷”，“不拘本司，不系朝参”的特殊工作方式，对理解翰林学士与皇帝的关系、与朝官的关系也很有帮助。其次，对翰林学士与中唐以后中央议政决策程序的关系应作进一步探讨。关于唐代中央决策，谢元鲁博士《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一书已经就宏观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指出唐代以御前决策会议、宰相决策会议、百官决策会议为议政决策的三个层次，中唐以后学士召对会议也是议政决策方式之一。但是谢著未及对翰林学士在中唐以后决策体系中的地位作进一步分析，本文或有助于补此之缺。第三，用分阶段的方法分析翰林学士是否合适。我们发现，翰林学士在唐代的发展历程往往被划分为形成、发展、定型等诸多阶段。其中，由于宪宗即位后对学士院在制度上采取了一些完善措施，学者对以宪宗即位作为两个阶段的分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我们对此表示认同。不过，阶段论的方法还有一些

① 参见中科院考古所编：《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北京，1959。马得志：《1959～1960年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七期。马得志：《唐代长安与洛阳》，《考古》1982年第六期。马得志：《西安市唐大明宫翰林院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年，第235页，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问题不易解决，比如德宗、顺宗在位的20年往往被视为翰林学士的“发展时期”，但实际上仅就德宗前、后期而言，翰林学士的地位和作用相差极大。因此，阶段论的方法既不够准确，也不利于对翰林学士的理解。翰林学士与皇帝关系密切，相比朝官系统是有一定特殊性的群体，我们认为尽可能以皇帝为中心，具体探讨各个皇帝执政下翰林学士的处境，或许更有助于对翰林学士与政治的关系作出较为清晰的描绘。第四，关于翰林院、学士院，学者一般都未作出较明确的区分。有的学者注意到“翰林院与学士院是两个不同的内廷机构”（程宗才语），也有学者开始关注翰林院技术杂流的状况并作了初步分类。^①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又陆续从各类文献及金石材料中搜集到相当数量关于翰林待诏的记录，基本可以概括出翰林院待诏的种类及其职能，这样对翰林院的格局、翰林院与学士院的区别也就比较明确了。本文即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作较为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同时也希望有助于完善对唐翰林学士及唐宋中枢体制发展演变的研究。

关于材料的运用，本文立足于史传材料，对两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全唐诗》及唐人文集、杂史、笔记小说等材料中有关翰林学士的记录尽可能进行辑录整理，并首先判定记载是否有误，是否翰林学士居职期间所为。对有疑问的材料若无法判明真伪，则尽可能作到避免使用。由于翰林学士多由当时

① 袁刚：《唐代翰林院诸技术杂流》，《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孙永如：《唐代的翰林待诏》，《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三期。

著名文士充任，史文中往往留下一些夸张甚至不准确的记录。最为典型的不准确的材料此举一例，如《新唐书》卷207《宦者上·仇士良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始，士良、弘志愤文宗与李训谋，屡欲废帝。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令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终讨除之，盖祸原于士良、弘志云。（又见《唐语林》卷三《方正》）

这段描述翰林学士与宦官斗争的文字绘声绘色，然考崔慎由历官，仅在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六～十二月间充任翰林学士，则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年）不可能出现崔慎由与仇士良斗争的场面。类似的错讹史文中时或可见，岑仲勉先生亦有所考订。本文虽无法一一加以考释，但在运用时尽可能做到互相检核，力求准确无误。此外，主要利用《金石录》、《集古录目》、《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山右石刻丛编》及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